

SUN ZHONG SHAN PING ZHUAN

孙中山

评传



云南人民出版社
施滉 著
刘彭陶 译

孫中山 評傳

SUN ZHONG SHAN PING ZHUAN

施滉
劉彭陶
著
雲南人民出版社

(滇)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张 波

封面设计：鞠洪深

孙中山评传

施 滢 著 刘彭陶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邮编：650011

云南专利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插页：1 字数：210000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

ISBN 7-222-02060-8 /K·235 定价：18.00 元

中译本序言

马 曜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作于 20 年代后期的《孙中山评传》，是中国人为了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家逝世三周年撰写的最早的传记之一。作者施滉（1900~1933）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杰出的无产阶级战士。这本评传是作者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东方史时撰写的硕士论文。当时曾得到他的导师东方史专家脱李特博士的赞赏，准备介绍给一家出版社出版。但是，由于后来在一次关于美国是不是帝国主义的谈话中，师生之间发生了争执，脱李特认为美国没有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施滉列举大量事实，反驳老师的错误观点，互不相让。脱李特不再提起出版施滉论文，国内研究党史的也未予注意，以致这本评传在斯坦福大学档案中埋藏了近七十年之久。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清华大学图书馆才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购回这篇论文的影印本原稿，共三百多页，内容极为丰富。由于蒋介石叛变后地下工作环境险恶等原因，20 年代致力于中国革命的云南老一辈共产党领导人张伯简、王德三、赵祚传等人，均没有留下系统的著作，因而施滉的这本《孙中山评传》就更加珍贵了。

1984年初，我和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主任朱家璧谈起为施滉立传的问题，并推荐关心施滉烈士革命事迹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遵道和中央民族学院讲师（副教授）赵履谦两同志撰写施滉的传记，得到同意后，由征委会周涛、王元辅两同志担任编辑，1987年交云南民族出版社公开出版。这段时间，我到北京访问过罗静宜同志，进一步了解施滉同志在美国和苏联从事革命工作的情况，因而萌发了翻译出版《孙中山评传》的心愿；随即通过杨遵道、赵履谦从清华大学图书馆复印一份《孙中山评传》，于1987年6月17日寄交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保存，征得朱家璧同意翻译出版，委托云南民族学院外语系副教授刘彭陶同志担任该书的翻译工作。1988年10月由刘彭陶致函该书的物质财产所有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同年12月收到该大学档案馆长罗桑尼·勒·聂兰的回信，略谓：同意翻译出版，祝计划成功。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参考了杨遵道、赵履谦撰写的《施滉》，请赵衍荪、何冠义及孙兰凤三同志在北京各大图书馆、书店帮助查找有关资料，并请云南民族学院从事过研究的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横山广子女士帮助查找论文中有关日本人名、地名和轮船名称等。经过八年多的努力，于最近将该书译完，约18万字。在翻译过程中，查证了大量资料，译笔流畅。1996年5月14日由译者报请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审查，立即得到批复：“刘彭陶同志并请告马曜同志：经研究室研究并请示省委党史工作领导小组，认为施滉烈士这部遗著，填补了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的主要空白。本书的出版发行，不仅是对烈士的悼念，而且对云南各族人民的教育和鼓舞，对现代史的研究，均产生大的推动和促进。同意公开出版和发行。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1996.5.14。”经我和译者研究决定，为了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和白族人民光荣的儿子施滉烈士，

谨以此书作为孙中山诞辰一百三十周年、施滉烈士的故乡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建州四十周年献礼。

(一)

施滉出生于云南省洱源县一个贫寒的白族小学教师家庭。1913年就读于云南省军医学校。当时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他常在街上看到流亡到昆明的许多越南难民，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常以香蕉充饥，目睹了当亡国奴的痛苦与辛酸，后来他一直不吃香蕉。1917年施滉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插班生，在图书馆任学生助理，半工半读。课余喜读《新青年》上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开始受到进步思想影响，与同学冀朝鼎、徐永煊等先后在校组织“暑假修业团”“唯真”“超桃”等学会，响应和宣传新文化运动。1919年5月，施滉等参加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上街游行被捕，获释时在校学生以学校军乐队迎接回校。他积极参与要求实现校内民主和学生自治的斗争，集中表现为反对封建官僚专制统治为内容的“三赶校长”的斗争。他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反对美国公使控制的学校董事会，担任“改组董事会全权委员会”主席。他是《清华周刊》的编辑委员，主编该刊的《国情报告》专栏，并在该刊先后发表了许多改革学校与社会的文章。例如：他认为学生应参与改变现在不良的社会，必须进行系统的社会调查，作改良的先导；他对学校当局歧视中文和中国历史感到气愤，主张清华学生出洋以前应提高国学水平，程度不够的不准出洋；建议修改清华学生留美五年为“留美四年，留欧一年”，并在暑假期间游历亚洲各国。针对当时风行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和“农业救国”等，施滉等人提出“政治救国”的口号，主张学习孙中山、列宁进行革命斗争的百折不挠的大无畏精神，通过政治途径来改造社会。由于施滉

在学校各方面的表现和工作实践，成为清华学生进步的倡导者和领袖，受到同学潘光旦、潘大逵、周培源等人的敬佩。1923年，施滉被选为清华学校学生会会长，他把“我是属于大家的”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1924年6月，施滉从清华学校毕业，即将赴美国学习，利用学校在学生出国前给的探亲游览费，和徐永煊、何永吉同学到广州拜见孙中山、李大钊，请教“将来如何做事，以为求学的方针”。他们到达广州时，正值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大会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2月1日，参加了列宁追悼会，4日拜见了李大钊，请示赴美求学的目的和方向。2月9日，孙中山亲自接见了施滉等三人，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涉及的内容包括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国的统一、人生观、以俄为师等问题，孙中山都一一给了他们满意的回答。施滉问孙中山：“我们觉得大元帅的人格的精神高尚，坚忍不拔，革命的事业，有孙先生在，是不会停止的。但是人寿不过百年，孙先生百年之后，谁能继续这种奋斗。我们觉得这是很可虑的。”孙中山虽然作了革命主要靠党的力量和纪律，不决定于一二个人的存亡的答复，但施滉似已觉察到孙中山革命事业后继无人的危险。

1924年秋，施滉到达美国，进了美国西部最负盛名的私立斯坦福大学学习。1925年国内爆发“五卅”惨案，美共召开工人大会，公开声援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施滉深感共产党是真正支持被压迫民族的，坚定了他加入共产党的决心。1926年5、6月间，美共区委书记莱文在旧金山区委召开的反帝大会上和施滉等人结识，莱文介绍他们参加美共领导的“反帝大同盟”。7、8月间，经美共同意，施滉和徐永煊在旧金山加入国民党左派，他们成立“中山学会”，团结国民党左派党员，与国民党右

派控制的“孙文学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用捐款买了印刷机，创办了《国民日报》，在宣传、组织留学生和华侨投入反帝爱国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27年，施滉与罗静宜结婚。3月，施滉、罗静宜毅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实现了从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工人。7月，汪精卫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强烈反对，公开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行蒋汪合流，使1925~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遭到失败。这时施滉在国民党旧金山支部提出声讨蒋介石的罪行，并请示美共中央同意，从8月至10月，以个人名义先后发表了十大宣言，驳斥国民党右派散布的种种谎言，捍卫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在《国民日报》上刊登出来。周培源回忆说：“施滉是中国留学生中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蒋介石的。”他因此而遭到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通缉，他的老家也被查抄。

施滉等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中的先进分子先后加入美共，为了集中领导，在美共中央领导下，秘密地设立了中国局，并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产生了中国局委员会，施滉任书记，徐永煊、冀朝鼎等为委员，罗静宜任妇女组织员。为了广泛团结群众，施滉等人在旧金山组织了“反帝大同盟”，通过它公开开展革命工作，凡赞成反帝和中国革命宗旨的均可入盟。在美国许多城市和古巴、加拿大等国华侨集中的城市，也设立了分会，总部设在旧金山。与施滉在斯坦福大学同学半年的雷洁琼回忆说：“施滉同志是个学者，又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他经常组织我们留学生和华侨，讨论国内形势、北伐战争、工人运动及国际问题。”周培源回忆说：“1927年夏天，美国西部的中国留学生在斯坦福大学召开一年一度的夏令营会议，施滉等向我介绍了‘四·一二’

事件的真相，可以说，我的政治启蒙教育是从那年夏天开始的。”1927年美共中央从芝加哥迁到纽约。1928年秋后，施滉等到了纽约，中国局和“反帝大同盟”也迁到纽约。1927年末，施滉等联合国民党左派，将《国民日报》改名为《先锋报》，继续揭露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动面目，介绍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把该报的影响扩大到半个世界。《先锋报》后来又改名为《华侨日报》，直至今天，仍然是旅美华侨中有影响的报纸。

1928年12月，在施滉即将离开美国赴莫斯科学习工作的前夕，以福斯特为首的美共中央为了在加拿大和古巴华侨中扩建党的组织，在与加、古两国的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后，派遣施滉前往这两个国家，在华侨中进行工作。同月，施滉到达古巴，首先对华侨作了调查研究，在1929年12月29日给中共代表团的信中说：“古巴最重要的糖业由美国资本家垄断，事实上是美国的殖民地，1898年从西班牙夺来的。古巴有华侨六七万，差不多全数是广东人。在西班牙统治时代，曾积极参加古巴革命运动，现在华侨大多数是工人和小贩卖，失业者甚多。华侨中的反动势力的代表就是国民党，其重要分子是商人及堂号会馆的头目，他们勾结古巴政府压迫华工的事实很多。”施滉根据调查确定了自己的工作方针，明确了团结的对象和斗争目标。他深入到华侨集中的制糖工人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把华侨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入党。以后，施滉又到加拿大，在华侨中建立了许多党支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代表团访问古巴时，施滉的革命战友仍在打听他的消息，对他十分怀念和崇敬。1929年2月19~31日，施滉主持了在纽约召开的中国局第二次代表大会，对于世界现状、美帝国主义、中国革命、华侨情形及中国支部工作有详细的讨论，选举了李道煊、徐永煊、张棠、罗维良、骆一伦五人为下届总支

部委员，谢剑、莫震旦、欧阳碧三人为候补委员，又选举施滉、李道煊、骆一伦三人出席将于3月1日召开的美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夏末，为了加强中国局的工作，施滉将张报调到纽约工作，并到火车站接他。据张报回忆说：施滉“品德高尚，平易近人，亲切热忱，没有一点架子，平时沉默寡言，在开会讨论时，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条理清晰，逻辑性强，很有说服力。我和施滉相处时间不长，但他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很大”。

1929年秋天，施滉到达莫斯科，分配至少共国际学校（即共青团团校）担任翻译工作，后来又调他到莫斯科近郊的一所青年工人学校当翻译。他在工作之余，较为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据罗静宜回忆说：“他有机会更深刻地学习马列理论和秘密工作方法。他在苏联又担任过太平洋职工秘书处的翻译，学习了关于职工会组织和斗争的经验。”他还曾用英文写过一篇分析印度社会情况的论文，交给美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

1930年秋末，施滉被组织派回中国，先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秘书处工作，不久又调到中共中央翻译科，任务是把党的文件译成英文。他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达到翻译一万多字的高速度和高水平。1931年4月，他被派到香港任海员工会秘书。当时，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党在白区的组织遭到很大损失，斗争非常严酷。他到香港就深入到海员中开展工作。在施滉到香港之前，党的早期杰出的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蔡和森于1931年3月受党的派遣，由上海到达香港，指导当时设在香港的广东省委的工作。施滉就是在蔡和森领导下工作的。6月10日中午，蔡和森去海员工会参加一次紧急会议，被窜往香港的叛徒顾顺章跟踪，蔡和森和施滉等四人同时被捕。蔡和森于当夜就被单独引渡到广州遇害。施滉被关押在香港监狱里，坚贞不屈。

由于广东省委和红色济难会的积极营救，加上施滉父亲（在香港任家庭教师）施少甫的奔走，得以保释出狱，7月被香港当局押解出境，党组织分配他到上海沪西区做工会工作。据程海峰回忆说：施滉在上海的时间仅仅几个月，就被组织派往北平工作。中共四中全会后，撤销了党的北方局，成立了顺直省委，又称河北省委。1931年4月8日，河北省委在天津准备举行常委会时遭到了破坏，省委机关先后有13人被捕。以后，省委机关移到北平，由王宏代理书记。施滉到北平后，于1932年5月担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长，1933年1月担任河北省委书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向华北推行新的侵略扩张，而蒋介石仍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于1933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集中兵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围剿”，在国民党统治区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在这种形势下，河北地下省委积极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6月，河北“反帝国主义大同盟”成立，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成全省反帝统一战线，决定加紧武装群众，组织民众义勇军，扩大民族解放战争。7月18日，中共河北省委为反对日本进攻河北发表宣言，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和准备出卖华北的罪行。河北省委又发表纪念“九·一八”一周年的决议，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抗捐抗税，士兵罢操，提出工农兵联合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号召，推进了河北的反帝爱国运动日益蓬勃发展。

在这期间，施滉以北平艺专教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积极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当时，罗静宜在香港被捕，送往广州监狱关押。施滉的父亲和女儿都在北平，他与父亲和女儿只见过一面，常说“尽忠不能尽孝”。据当时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周培源回忆说，他在北平和施滉约见过两次。又据冀朝鼎回忆，当时施滉任河北

省委书记，“冯玉祥在张家口搞抗日联军，在这方面党的工作由施滉领导。后来，冯玉祥失败，有个军事部长叛变，施滉因而被捕牺牲。”经过情况是：1933年冬天，施滉和其他十三位同志在北平艺专开会，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敌人包围，施滉等曾开枪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被捕。罗静宜回忆说：“被捕者共十四人，其中除施滉外，有个姓谢的文学家，也是坚贞不屈，……施滉是在被审判时，历数了国民党军阀的罪状，而当场被杀害的。……牺牲后连尸骨都没有留下。”远在美国的华侨，听到施滉为革命捐躯的不幸消息，悲痛不已，垂泪悼念。美国共产党把每年1月1日，定为“施滉纪念日”。中共河北地下省委在施滉牺牲一周年时作出决议，纪念施滉烈士英勇牺牲，号召向他学习。施滉的母校——清华大学，1949年4月，解放后的第一个校庆纪念日，在清华园图书馆门厅正面墙上，修建了一块施滉纪念碑，上面镶着烈士的头像，镌刻着烈士的简历和下面的题词：

他是清华最有光荣的儿子

他是清华最早的共产党员

他为解放事业贡献了生命

施滉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中华民族、国际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白族人民的优秀儿子施滉烈士就义已经半个多世纪，尽管岁月的流逝，不断冲刷着人们对往事的回忆，但施滉的光辉业绩将永放光芒，鼓舞着人们为振兴中华和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①。

（二）

施滉遗著《孙中山评传》的写作用了两年时间，于1928年

^① 以上施滉生平事迹，参见《施滉》，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

完成。1926年，他在斯坦福大学攻读东方史硕士研究生。当时反动派以暗杀相威胁，他满不在乎，更勤奋地为革命工作的同时，以惊人的毅力完成必修课的学习任务和硕士论文的撰写。他抓紧时间搜集资料，引用当时中外各国109种书报杂志与评论，其中英文56种，中文53种，有些原始资料非常珍贵。当时中国留学生的学位论文大多以外国题材为选题，施滉却致力于研究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除叙述了孙中山先生一生经历的失败、挫折和成功外，着重论述、分析和肯定了孙中山实行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评定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论文共分七章，现将全书大要及其主要论点摘录如下：

第一章论述孙中山领导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叙述了孙中山的家庭及早期革命活动。甲午战争期间，他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1896年在伦敦蒙难获释后，系统地论述了有名的“三民主义”学说，认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他已注意并吸收了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孙中山进一步组织“同盟会”，在布鲁塞尔、柏林、巴黎召开了3次会议，第四次会议由1906年在东京召开，有17个省的学生参加，他坚信不久革命会取得成功，正式采用了“中华民国”这一名称。1904年孙中山撰写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的著名论文。1906~1911年，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有8次之多，主要活动地带为广东、广西和云南边界地区，最后一次是1911年的黄花岗之役。施滉认为：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加上巨额外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入侵，经济破产，人民遭受苦难，引起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运动等一系列的人民起义，“百日维新”改良运动失败，使爱国进步人士坚信“必须发动一次推翻清

廷的革命行动”。这就是辛亥革命的远因。作者指出：辛亥革命的近因是1910~1911年长江、黄河、淮河及大运河各流域严重的水灾引起饥荒，传染病横扫东北各省。不仅贫苦人民不满现状，就连直隶（河北）、山东和云南等省的绅商也强烈要求收回外国资本家从清政府手中夺去的采矿权，特别是铁路国有化问题及四川绅商进行的反抗。这时孙中山派人到湖北指导革命活动，争取新军，发生了武昌起义。1912年1月1日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缔造者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施滢正确地指出：参加这次革命的有反对铁路国有化和希望新政府保护矿山的资产阶级，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而生活悲惨的手工业工人、农民和小商人，为争取权利和促使国家现代化的知识分子，但是在革命过程中，一些革命的领导人、知识分子和军人，“在西方国家和日本受过教育，因而放弃了革命的反帝因素，只局限于民族主义的反对清廷的呐喊。所以实际上说来，辛亥革命人士的所有宣言都是反对清廷的，而不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为了取得列强承认，临时政府宣言承诺保护列强投资利益。按照孙中山原来的革命计划，中国在成为民主国家之前，必须经过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军政时期结束之后，他将实施临时约法以进入训政时期，然后制定一部永久性的“五权宪法”，同他的“三民主义”协调并进。他的追随者认为这些都是理想而难以办到，使他的心情为之沉重。

当时大清皇帝尚未退位，袁世凯掌握着北洋陆军和海军。孙中山审时度势，让袁世凯当临时总统，赞同共和主义，后者会立即迫使大清皇帝退位，孙中山可以立刻辞职，以图重整革命事业。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3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参议院致电袁世凯，提醒他遵守由孙中山起草经该院3月11日公布实施的《临时约法》。孙中山于4

月1日辞去总统职位，从事设计制定修筑铁路计划。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施滉认为：“孙中山低估了北方反动势力，即保守势力和封建主义的力量，而袁世凯就是这些顽固势力的死硬代表。”

《评传》第二章题为“从‘二次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2年秋，同盟会中的右翼领袖人物宋教仁和黄兴将该会改组成为议会政党——国民党。由于孙中山同意这次改组计划，他对降低政党质量也负有责任。在1913年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赢得绝大多数席位。宋教仁成了多数党领袖，他提倡内阁制，认为总统制会导致独裁暴政。3月20日袁世凯指使其国务总理赵秉钧派人在上海火车站上刺杀宋教仁，引起侨居日本的孙中山怀疑袁世凯的品格，两人之间的友谊破裂。袁世凯为了筹集内战必需的资金，于4月26日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贷款2500万英镑的合同。施滉指出：孙中山的呼吁和参众两院反对这项贷款的原因，一是它建立在外国人协助下的征收中国盐税系统之上，并将收入作为借款担保；二是它违反了宪法。施滉对为什么外国政府偏要支持他们的金融家发放这一项非法借款，作了精辟的分析：“首先，他们想确立外国财政对中国的控制。其次，这是世界上最佳投资中的一笔，可以取得厚利。第三，他们渴望与袁世凯总统达成几大宗军火交易。第四，俄国外交人士在蒙古问题上可以大占便宜，而英国也可能在西藏方面为所欲为。第五，他们将解除中国国民党人的武装，……最后一点，……就是他们发觉袁总统是他们需要的人物，要他干啥就干啥，……懂得上述情况后，我们不难理解：在后来的岁月里，为什么孙中山那么强烈地实行其反帝计划的原因。”五国借款引发了“二次革命”。6月9日，袁世凯下令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的职务。7月22日孙中山给了袁世凯“最后忠告”的电文，袁世凯不予理睬，挥师南下，直逼长江流域。7月12日江西宣布独

立，苏、皖、闽、粤、湘等省都督也参加“讨袁”，袁世凯撤销“孙文管理全国铁路的权力”。1913年夏，袁世凯取得了胜利，宣布孙中山为叛逆。8月9日，孙中山避居日本。

“二次革命”失败后，在刺刀压力下，10月7日北京国会选举临时总统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1914年1月，国会被解散，各省议会也被取消。12月29日，宣布总统任期由5年延至10年。1915年初，称帝活动开始，接踵而来的是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5月7日袁世凯在日本最后通牒面前屈膝投降，同年底宣布自己为中国皇帝。施滉指出：孙中山辞去总统职位时，“他并非没有意识到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表面性。……在维持‘小息’方面，孙中山失败了，他的许多追随者腐败了。……当宋教仁惨遭暗杀时，孙中山意识到，采取改良主义手段，绝不能提高中国的福利；……他不得不重新回到原来的革命纲领上来。他下决心重新开始革命。”他抵达日本不久就开始组织“中华革命党”，野心家和因袭守旧者被淘汰了。但正如施滉指出的：“孙中山又一次犯了严重错误，即只诉诸军事行动，而忽略了组织群众的重要性。”1915年春，孙中山决定对袁政府进行一次打击，派遣其追随者分赴粤、滇、湘、桂、苏各省准备一次总起义。这次不完全成功之举却“唤醒了疲惫冷漠的中国人行动起来反对袁世凯公开化的帝国政策”。12月25日，云南省宣布独立。这次“第三次革命”由于蔡锷的军事才能，指挥云南军队在四川击败了袁皇帝的军队。接着各省纷纷参加“讨袁”。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民国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宣布《临时约法》仍然生效。

施滉指出：“如果把孙中山1913~1916年的革命活动是以推翻袁世凯政权为目的来划分的话，那么他1916年以后的斗争可以说是为立宪或信守法理而奋斗。许多人所说的‘护法运动’的

起因，可追溯到中国参加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孙中山很了解：在欧洲进行的战争与中国没有牵涉。中国卷入与外国列强的战争状态，将无疑让中国军阀加紧控制这个国家。”后来事态的发展，助长了从袁世凯留传下来的类似封建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国会拒绝对德宣战，黎元洪总统拒绝解散国会，引入调解人张勋于1917年7月1日演出复辟闹剧。7月2日孙中山指示所有革命军队讨伐国贼。逃往日本公使馆的黎元洪，指令副总统冯国璋行使总统职权，又一次指定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决定不召开国会，宣布对德宣战，使护法运动又从头开展。黎元洪受北方军阀的胁迫而解散国会，张勋垮台后，冯国璋和段祺瑞拒绝召开国会，因此，护法的人士就敦促孙中山领导保护《临时约法》和重开旧国会的运动。就是这次护法运动促使孙中山于1917年7月间重返广州，以黄埔海军站为其司令部。当时广州人士希望冯国璋重开旧国会，重组共和国内阁，并避免南北分裂，建议黎元洪复职。在南方遭到痛斥的段祺瑞以中国的工矿业和其他一些企业作为担保，于1917年8月从日本得到了“西原借款”，开始组织对南方进军。施滉指出：“这些借款资助了安福系反对南方拥护宪法人士的斗争，其情况正与1913年资助袁世凯反对二次革命的五国银行团借款相类似。其次，这些借款使日本甩开西方列强而加紧对中国的控制。”从而导致了中国内战的爆发。8、9月间，西南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而支持孙中山的护法运动。8月21日云南督军唐继尧要求黎元洪复职并重开国会。31日由南方军政府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并正式选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北京政府下达了逮捕孙文的通令。

施滉分析了孙中山1917~1918年的活动：“广州阵营内部有些反动势力也从事反对他的活动。……大多数旧国会议员是些机会主义的官员和动摇不定的知识分子，他们随时都有背叛护法事